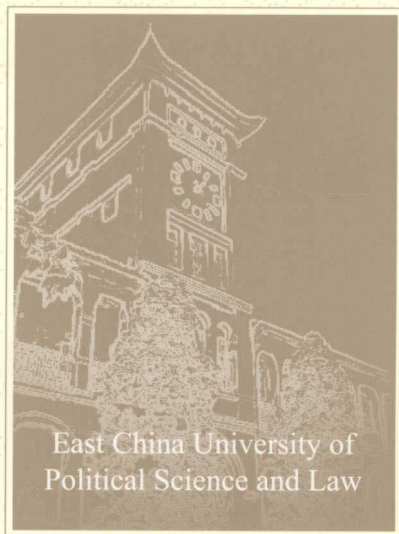


复校三十周年庆典文丛



思想与文学传统间的鲁迅

钱伟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思想与文学传统间的鲁迅

钱伟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与文学传统间的鲁迅 / 钱伟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9

(华东政法大学复校三十周年庆典文丛)

ISBN 978 - 7 - 5036 - 9879 - 8

I. 思… II. 钱… III. 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396 号

思想与文学传统间的鲁迅

钱 伟 著

责任编辑 高 山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A5

印张 8.125 字数 197 千

版本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 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 陶 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036 - 9879 - 8

定价:2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纪念,以学术的名义

——华东政法大学复校三十周年庆典文丛总序

忆往昔,桃李不言,自有风雨话沧桑。1952年6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华东政法学院由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等合并组建成立。其后由于历史原因,于1958年和1972年两度停办,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复校。2007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华东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2009年系华东政法大学复校三十周年。

自20世纪50年代从华政的红墙绿瓦中走出新中国第一批政法干部开始,五十多年来,学校在办学条件、办学规模、办学层次、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飞速发展。目前,学校设有长宁、松江两个校区,占地面积1300余亩,是“教育部依法治校示范校”、“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建筑保护单位”、“上海市花园单位”、“国家司法考试阅卷基地”。学校设有22个

本科专业,18个硕士点,2个专业学位点,10个博士点,1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1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3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学校在教育部的教学评估中两次获评优秀,毕业生司法考试通过率在全国名列前茅,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复校三十年来,华政披星戴月,风雨兼程,赢得桃李满天下,更在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华政的莘莘学子,也见证着学校各方面的长足发展。硬件方面,从帐篷办学到长宁校区的精致典雅,再到松江校区的恢宏大气且美轮美奂;软件方面,从实现上海市法学博士点零的突破,到一举拿下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获得非法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再到填补上海市法学国家重点学科零的空白,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法学类立项数名列全国第一。而2007年3月,华政更名大学的成功,更标志着学校从此踏上了多科性特色大学的新的征程。

此番出版复校三十周年庆典文丛,华政并未走“遍寻成功校友、为其寻章摘句并编撰成册”之路径,而想虚中求实,为青年教师提供出版著作、展示才华之机会。故而,入选本文丛的,绝大多数是并不拥有教授职称的青年学者。华政奖掖才俊、提携后学之美意,尽在其中矣!

值此华政复校三十周年之际,谨祝这颗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更加光彩夺目!

华东政法大学复校三十周年庆典文丛编委会

2009年9月

绪 论

抱定了“暗黑的宿命论”的周作人曾把文化批判（“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称为“伟大的捕风”。^①虽然在这一工作层面上，鲁迅和周作人有着很多一致的东西，但当我们试图把周作人命名的这个词放到鲁迅身上的时候，总让人感到少了一些什么。深究下去，那让我们感到少了一些什么的，就是鲁迅身上“现在”与“传统”间的持续张力。正像“故乡”这个虚妄幻象在其文本中的复杂交织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的传统既是鲁迅清醒地意识到并努力想要驱除的东西，又在实际上成为他思想、情感力量的来源。如果放弃情感—理智模式过于化约式的解释，我们在鲁迅身上看到的，是古代思想和文学传统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历史现实中的复杂处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所面临的，是被陈寅恪称为“数千年未有之鉅劫奇变”。引起这巨变的，自然有社会制度层面的原因。就像陈寅恪所强调的，代

① 周作人：《看云集·伟大的捕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表了中国文化的“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三纲六纪之说,是随着其所依托的原有社会、经济制度的崩溃而“消沉沦丧”的。^①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已不足以应对世界发生的新的变局。从太平天国,到曾国藩,到张之洞,正一步步显示出传统在现实面前的退却,而“五四”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不过是其极致的表现。传统的危机也就是解释的危机。当人们不再能凭借其通常的经验方式、理解方式、行动方式或解释方式来把握他们所面对的世界的时候,这一种传统就发生了危机,就产生了对传统进行重新解释的需要。^②“五四”对传统全盘否定的激进态度也是一种解释。

鲁迅对传统的透视与犀利批判使他成为这一代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由拒绝传统而一脚踏入的虚无深渊以及直面这一自我深渊的勇气又使他失去了时代的代表性——自我否定的力量使鲁迅远远走在时代精神的前面;这股力量使对传统的批判由主体对客体的外在行为转化成主体自身内部的斗争——正像竹内好特别揭出的“挣扎”一词所揭示的。这代表性和唯一性构成了鲁迅文本的经典性。虽然今天仍不断有超越鲁迅、抛弃鲁迅的论调,但鲁迅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当然应该超越鲁迅,但我们能不能超越则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时间并不会给我们增加什么筹码。那种以为在任何领域今必胜古的肤浅的庸俗进化论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了。可叹的是,很多站在时间的肩膀上的自信的文化英雄,所依的还是这样的逻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是传统转换过程中的“典范性的范例”。我们在其中能看到面临困境的传统在真实的现实处境

^①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载《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页。另参见罗志田对废除科举制的影响所作的个案研究:“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载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美]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以下。

中是怎样遭到扬弃的,看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从作为经典的鲁迅的作品中寻找如何面对传统的答案;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应该被超越。但作为“负荷着过剩和持久的意义”的经典,“总是拒绝对论性解释的文本”,^①鲁迅的作品又具有不可超越性。每一次阅读都提醒我们拒绝对现实与自我的简单认同,警惕对语言与历史的偶然性与含混性作出化约式的单一解释。它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文本中的“他性”(otherness),克服自身的惰性与无端的自满。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一个个案研究,选择鲁迅的意义就在于此。

黑格尔的思想传统曾极为深远地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使我们相信在从古至今的一系列伟大作品中,存在一条看不见的规律,有某种“命定的力量”在引导着历代艺术家前进。梅洛—庞蒂在讲到绘画的历史时曾说:“绘画的真实历史不是那种把绘画放到过去,并且祈求超艺术家和命运的那种历史。它是这样的历史,它把绘画完全放到现在,使之寓居于艺术家身上,并且把这位画家重新纳入到画家们兄弟般的关系中。”^②这种寓居于艺术家身上的历史被称为“生命的历史性”。在这段对艺术(史)的思考中,我们至少可以领悟到,艺术的“真实”历史并不在于过去或某种抽象的规律之中。就文学来说,文学的历史也需要把自己放到作家的“生命的历史性”中去。文学古今演变关注的是演变,其目的是打破延续至今的文学史研究中人为造成的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割裂。但文学古今演变不是盲目地在古与今之间打转,捞取在我们的搅动下漂浮上来的任何东西;而是立足于作家的“现在”,立

^① [美]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20页。

^② [法]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2页。

足于他的“生命”，使文学（写作）寓于他的身上，并在其生命中理解、探求寓居于中的文学的“历史性”——也正是我们所要探究的文学的演变。因此，以下的研究把鲁迅的写作/作品放置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放置在他对生命所作的严肃、不懈的思考中，来看待鲁迅及其作品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学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

如果把“流亡”作为一种精神状态，那么鲁迅的流亡就是从逃离故乡开始的。对周围虚伪人情的难以忍受，使他产生了局外人（outsider）的感觉。这“局外人”既外在于俗世的沉沦中的人们，也外在于所处身的现实世界。这种感觉引导着鲁迅一步步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眷恋的人们，最终甚至离开了熟悉的“自我”。在代表了近代精神的欧洲新思潮的激宕下，他判客观世界为虚幻，精神世界为实有；诊断出传统文化之病就在既无视人与自然分离的历史现实，迷妄于与自然的一合，又沉溺于本能习性之中，不思人类精神之发扬。在对西方文明推源溯流式的考察中，指出以精神为鹄的的20世纪文明之大势，开出了以“信”为基础的“取今复古”的药方。而能达到这一目的，开拓这一真正真实的世界——精神世界——的，首先是文学。显示了鲁迅和他的欧洲导师们的不同的，或者说，显示了鲁迅身上的历史性的，是这个精神世界缺乏具体的内容。与有着神圣—世俗二元对立景观为背景的欧洲精神不同，缺乏这种对立而产生的精神世界注定是空洞的，至多只能提供一种与现实（世俗）对立的姿态。我们固然能在庄子、阮籍、嵇康，一直到李贽、龚自珍等人的身上看到这种姿态的影子——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使自我对立于现世的传统，使鲁迅（包括他的同时代人）能接受欧洲的新思潮——但仅仅依靠姿态是不够的。《狂人日记》的写作使鲁迅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对立于世俗的启蒙者姿态的虚妄性。这当然是鲁迅不懈思考的结果，但也是历史中偶然的因缘际会。写作中的偶然（偏离）使他再次“流亡”，踏上了更为孤独的，寻求更确定的精神凭依

的探索之路。这就是本文前两章所要阐述的内容。

置于如此丰富的生命世界里,我们试图在中国思想、文学传统的背景下追索鲁迅寻求精神凭依,寻求自我的历程——这也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古今演变的任务之一。正像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所描述的,当女人提笔写作时,她已经置身于男性价值之中。鲁迅,包括 20 世纪的任何作家,开始试图在写作中确定自己的声音之时,他也早已置身于传统之中了。离开了这一传统来探讨鲁迅的思想或文学,就像离开了水来探求鱼的生命奥秘,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如果简单勾画传统思想中对自我的安顿方式,除了儒家提供的习传伦理、王道历史、天理之外,道家思想为对立于社会的自我提供了另一种资源:自然。虽然这个自然往往被称为“道”,但这个“道”显然和儒家的“道”(或“理”)是不同的——儒家的“道”内在于历史,是王权秩序的表现;道家的“道”则外在于历史,作为与人类社会对立的一方出现。这个“自然”至少为自我提供了两种选择:天的自然与人的自然。前者把自我融入到“道”的本体中,后一种则停留于人的情欲的自发状态。而从历代先觉者——在这里主要是文学家——的经验来看,都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使自我获得确定性。这种思想传统的近代衍变——在知识与自我情感中寻求确定性——从王国维、徐志摩、周作人等人的身上也不见其成功之处。鲁迅在此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但对这一传统,而且对其现代形式(如审美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抵制归根到底仍只是一种态度,鲁迅最终无法找到自我所渴求的确定性。这展示了传统的限度,但也并非没有现代性问题本身的因素(就像马克思的那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寓示的)。

思想并不是赤裸裸的,需要一定的形式。这形式既包括具体的书写体式,也包括更广泛的语言。就前者来说,中国文学自近世开始的文学结构上的调整(从抒情到叙事)正反映了自我日趋复杂化的要求。从

鲁迅的古典小说研究到其小说创作实践,都能见出他对这一历史趋势的敏锐把握。而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绩,也继《红楼梦》之后为这一文学结构调整的最终完成画上了句号。这一切当然都是在汉语言中发生的。虽然对语言的关注在早期(尤其是明代以来)是对文学语言与生活世界之距离的担忧,但到19世纪末,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已演化为文言的危机。在知识分子对待语言的三种策略——修补、净化、变革中,变革最终取得了成功;表现为白话取代文言成为合法的文学语言。与胡适的乐观态度不同的是,鲁迅并不以为这是问题的最终解决。他对语言的局限,对此一阶段白话的局限的清醒认识以及向这种局限性的不懈挑战,在在显示了鲁迅文学家的立场。这也是本文后三章期望展示的鲁迅对思想、文学传统的拒斥与继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里所作的,实际上是在中国思想和文学传统的背景下,对鲁迅及其作品重新解释的尝试。在此,首先涉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态度。20世纪中国文学的确有浅陋的一面,尤其在与同期西方文学的对照之下。夏志清在此态度上的转变也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在1978年为《中国现代小说史》写的“中译本序”中他承认:“本书撰写期间,我总觉得‘同情’、‘讽刺’兼重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它处理人世道德问题比较粗鲁,也状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来。”但“本书1961年出版后,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现代文学传统认同”。^①这个传统简单地说就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的确,在大量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人们正为了生存而挣扎。“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②连生存的权利都没争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② 萧红:“生死场”,载《萧红作品精编·小说卷》,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得的人们,只能像动物一般在本能的驱使下活着。正像萧红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给我们展示的,“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①这些作品正是要给他们(包括自己)争得做人的权利,做人的尊严。这样的努力,我们是没有权利以一句“肤浅”而把它们轻易抹杀的;否则正显示了我们自身的肤浅。当这样的人在“人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下“直截了当不做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我们应该站在哪里?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浅陋”,是由此一时期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决定的。它的人道主义的特点,社会小说、市民小说的小说类型,缺乏更深刻的精神探求……同时也展现了文学的人间性的特点。“人的文学”,这个“人”并不是抽象的。

韦勒克曾说过:“研究文学的人能够考察他的对象即作品本身,他必须理解作品,并对它作出解释和评价;简单地说,他为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先是一个批评家。”^②正像他把文本作为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前提一样,虽然我们关注的是“演变”,但离开了文本来谈演变是毫无意义的。为此下面的研究始终立足于文本分析。

解构主义的文本分析策略注意的是文本中由文字、修辞、结构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缝隙和由此导致的文本意义的不稳定。这种阅读方式照亮了很多为传统阅读所忽略的东西,但在这种洞见(insight)中文本丧失了深度——虽然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但这些不同的层次是处于同一层面的。罗森在解释施特劳斯(Leo Strauss)区分柏拉图对话的“表面意义”与“深层意义”时说:

所有戏剧,以及更一般地说,所有艺术作品,都必然有一个表面,也就是表达心意状态的外在动作、有节律的谈话或符

① 萧红:“生死场”,载《萧红作品精编·小说卷》,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② [美]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号象征,以及一个由艺术家的深意和观众的反应二者共同构成的更深刻的内部。表面掩盖了深度,不是由于艺术家的不诚实或表里不一,毋宁说,只有通过表面的具体性,深度才能表现自己,此乃事物的本性。^①

我相信,鲁迅的文本正符合经典的这种“表面意义”与“深层意义”的复杂特征。所以在寻找文本中的缝隙,打破其唯一、固定的解释的同时,也不放弃对其深层意义的探寻。

冯友兰曾把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看作是对古代文献解释原则的论争——哲学的解释还是文字的解释。“文字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②这种解释原则的差异也许可以对应于现代解释学中加达默尔与施特劳斯的分歧。宣称“合法偏见”的加达默尔认为“应该比作者本人对自己的理解更好地理解作者”,而固守“字里行间”的施特劳斯则宣称“思想史家的任务是恰如过去思想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它”。^③如果撇开其间存在的哲学观念上的差异,我们可以借来作为两种文本解释策略所期望的结果。希望下面的分析能体现我们选择,贯彻“恰如过去思想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它”这一原则的努力。

① 转引自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载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③ 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载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取今复古:精神向度的确立

——精神探索的开始 009

逃离与寻找 010

萧条:对传统的诊断 014

科学与迷信 020

诗 024

《狂人日记》:自我设定的“开始” 026

文本中的断裂 027

沉默与开口 030

开启的两个方向 033

第二章 抵抗的姿态:对传统的拒斥与批判

——精神探索的深化 035

从来如此 036

闻见道理 037

奴性 041

权力 044

故乡 046

身与名 054

第三章 传统与现代中寻找自我的努力

——精神探索的核心 060

寂静里的声音:对生命的怀疑 062

与道一体:阮籍的选择 070

情与欲:自我的另一种可能 078

王国维的文学之路:传统在现代处境中的审美化倾向 084

打油诗抑或其他:鲁迅对审美化的拒绝 092

确定与怀疑:传统的限度 104

第四章 抒情与叙事:寻找自我形式的选择

——精神探索的形式 119

寻找自我与文学形式的关系 122

在抒情诗中的推进 122

叙事的介入 130

《中国小说史略》:小说传统的建构 136

鲁迅的叙事形式 150

从《怀旧》到《故事新编》 150

叙事与抒情之间 163

第五章 语言困境及其超越的努力

——精神探索的边界 170

危机:文学、文言、民族 173

修补 174

净化 176

变革 181

鲁迅的语言策略 192

鲁迅小说中的语言问题 192

“关于翻译的通信”:创造新的语言 203

鲁迅的语言实践 210

胡适与鲁迅:对白话的肯定与保留 210

修辞与情感:超越语言的努力 215

参考文献 232

后记 250

绪 论

抱定了“暗黑的宿命论”的周作人曾把文化批判（“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称为“伟大的捕风”。^①虽然在这一工作层面上，鲁迅和周作人有着很多一致的东西，但当我们试图把周作人命名的这个词放到鲁迅身上的时候，总让人感到少了一些什么。深究下去，那让我们感到少了一些什么的，就是鲁迅身上“现在”与“传统”间的持续张力。正像“故乡”这个虚妄幻象在其文本中的复杂交织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的传统既是鲁迅清醒地意识到并努力想要驱除的东西，又在实际上成为他思想、情感力量的来源。如果放弃情感—理智模式过于化约式的解释，我们在鲁迅身上看到的，是古代思想和文学传统在 20 世纪前期中国的历史现实中的复杂处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所面临的，是被陈寅恪称为“数千年未有之鉅劫奇变”。引起这巨变的，自然有社会制度层面的原因。就像陈寅恪所强调的，代

① 周作人：《看云集·伟大的捕风》，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 页。